

周永新 序

1977年至198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任教，期內曾受社會福利署委託進行研究，目的是檢討當時的公共援助（即今綜援）制度，看看是否有改善的必要，使生活困難的市民得到適切的援助。

政府對研究所用的字眼，雖無承諾將增加公共援助金，或要加大力度減少窮人的數目，但在我的理解裏，政府當時面對的貧窮問題，已不能坐視不理！但政府要改善公共援助制度，首先便要對貧窮現象有所認識。因此，我進行的研究，首要任務是如何量度貧窮，也就是一般稱的「貧窮線」的界定，然後才是識別哪些市民生活貧困、他們貧窮的成因，以及怎樣的援助金額才可以協助他們改善生活。

這項第一次在香港進行關於貧窮的研究，今天我再次提起來，是有原因的。第一、該項研究涉及訪問近千個住戶，當時協助我出任訪問員的，其中一位正是我現在寫序的作者黃洪博士。我不知道黃博士是否做了該項研究的訪問員後，所以繼續關心香港的貧窮現象，但從本書的內容來看，三十多年前的經驗，確實對黃博士日後的學術興趣起了啟發性的作用。第二、貧窮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社會現象，隨着時代的變化，對貧窮的理解也有分別。我三十多年前所做的調查，只是一個開始，幸而有不少學者和關注組織延續這方面的研究，社會人士今天對貧窮才会有進一步的認識，也加深了他們對窮困者的關懷。在眾多延續的調查和研究中，我可以肯定，黃博士所做的是最有深度和貢獻。

古語有云：「青出於藍」。我相信對貧窮的研究，黃博士現在達到的成就，已超越了我的水平。這並非謙虛之辭，而是我看了去年黃博士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完成關於香港低收入家庭生活方式的調查，我明白到，黃博士對窮困市民的認識，已不再限於數字上，而是深入到他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黃博士現在編寫的這本書，是他積累十多年來研究工作的成果，也是到今天為止，對香港貧窮現象最詳盡和符合科學要求的報告。其實，我早有意編寫相同題目的書，但礙於其他事務，始終未能如願。現在有了黃博士的書，我心頭好像完成了一

件事，又好像自己的擔子別人負上了。當黃博士邀請我為他寫序時，我不但高興接受，也慶幸研究社會福利的學者能為生活困難的市民發聲，喚起社會人士的關注，並催促政府早日採取措施以解民困。我相信黃博士出版這書，也與我有以上同一的期待。

周永新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余志穩 序

《「無窮」的盼望——香港貧窮問題探析》是黃洪博士總結過去十八年研究香港貧窮的一本浩瀚著作。本書填補了學術界對香港貧窮知識的空白，同時亦記錄了黃博士一直關懷弱勢社群、身體力行推動香港扶貧政策的歷史點滴。

一直而來，黃博士不單為學術界做貧窮研究，更不遺餘力協助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爭取更完善、更到位的扶貧政策。雖然我擔任樂施會總裁僅有一年，但樂施會早於1995年已開始與黃博士合作研究出現貧窮群體的結構原因，並完成研究報告《去權與充權——關於香港低收入住戶的探索性研究》。樂施會其後成立香港項目部，專責撥款推動香港扶貧的倡議項目。此後，黃博士更積極參與樂施會的邊緣勞工研究及貧窮報告調查，他的研究對梳理在職貧窮的成因及推動最低工資立法，實在功不可沒。

早於我在社會福利署擔任署長時，我已認識黃博士，並不時與他交流扶貧的意見。他十分關懷弱勢群體的處境，願意走到群眾中與他們同行。他的建議建基於社會底層的利益，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和分析，解構香港貧窮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並提出針對性的政策構思，對完善香港社會保障制度實在有一定的貢獻。

本書綜合了黃博士過去量性及質性貧窮研究的結果，搜羅大量最新的資料論證香港貧窮的成因源於本地經濟的轉型、社會的排斥及社會資本的弱化，並提出今後的扶貧策略的大方向：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機會、重建社區網絡、完善不同的勞工法例及社會保障制度。適逢扶貧委員會已成立，黃博士在書中更建議扶貧委員會未來應訂立減貧目標，加快推展扶貧工作，包括設立低收入家庭補貼、全民性的退休保障計劃等，令香港的扶貧政策走出短期、零散、補救的格局，可謂真知灼見。

此外，本書亦剖析不同貧窮群體出現的結構成因，當中包括在職人士、少數族裔、婦女、長者及青年，對樂施會處理香港五大貧窮問題——在職家庭、長者、婦女、少數族裔及跨代貧窮——有很大的幫助。本書提供最新的理論視點，剖析社會不公義的制度對各弱勢組群的影響，有助樂施會設計具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及推動相關的

扶貧倡議項目。

最後，本書為修讀通識的中學生及研究貧窮議題的大學生提供了大量的數據、研究方向及解決貧窮問題的構思，這書可說是研究及解決香港貧窮問題必讀的著作。它帶給讀者一個信息：貧窮源於不公義，而這也是樂施會一向以來的信念。解決貧窮問題，需要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攜手改變社會的不公義制度、協助貧窮人自主自決。

余志穩博士

現任樂施會總裁

前社會福利署署長及扶貧委員會秘書長

自序

本書由構思到刊印歷經接近十年的時間。早於2004年，我已計劃整理自己由1995年至2003年完成的各項香港貧窮研究，出版一本系統地分析及評論香港貧窮問題的中文書籍。可是，單單是整理初稿已經用了三年的時間。一方面，自己的能力及時間有限，另一方面，由2004年至2007年間我亦同時進行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深水埗區議會及樂施會所委託的不同貧窮研究。當時，我希望將較新的研究結果加入本書。其後，資料不斷更新，書寫不斷延後。

直至2012年，筆者剛好完成兩份研究（匱乏及社會排斥研究以及設立最低工資對弱勢社群影響研究），因有較新的資料可以引用，所以便決心把握時機完成書稿。剛好中華書局與我接觸，希望出版一本有關香港貧窮的書籍，本書才終能免於胎死腹中，與讀者見面。

十年時間，時寫時停，既因事忙未能專心寫作，更因思前想後——對解決香港貧窮問題的思路，仍覺得想不清；對能否解決貧窮問題的前路，亦覺得看不通。自己想不清、看不通的東西，能對讀者有用嗎？今天，我鼓起勇氣將這本未盡如己意的作品出版，但我清楚知道對香港貧窮的成因以及對解決香港貧窮問題的方法，本書提出的只是初步的答案。我只期盼整理至此刻為止自己對香港貧窮的思考，一盡公民與學者的責任。

本書綜合我曾經參與的多項香港貧窮研究，以及其他機構和人士的研究結果，加上自己在參與民間倡議工作時多方面的思考，結合為有理論分析、有實據資料及能反映香港實際情況的論述，從而提出解決香港貧窮問題的看法和思路，期盼供讀者參考和引起更深入的討論。

本書其中一個目標讀者群是香港的中學生及大學生。我希望他／她們在分析香港貧窮問題以至撰寫報告及論文時，不單會參考本書論據，更能夠發揮獨立及批判思考的精神，就書中不同觀點、理論及政策的優缺點作出更深入的分析。最重要的是盼望他／她們認同貧窮這深層次矛盾源自不公義。我深信必須得到年青一代共同參與，一起去改變社會的不公義，貧窮方能真正消除。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必須要感謝眾多人士、團體與機構的協助，但本書的錯誤及不足肯定是筆者的個人責任。

我首先要感謝的是在各項研究中曾經接受訪問及提供資料的人士，他／她們大多是香港的邊緣社群。幸得他／她們願意發聲和回應，才有本書眾多的個案及數據，令我們了解香港貧窮人士的生活和感受，得以明白貧窮不單是一堆冷冰冰的數字，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士的真實經歷。我衷心感謝曾協助我聯絡這些被訪者及資料提供者的團體和機構，也藉此機會向這些致力改善窮人處境的團體和機構致敬。

其次，我要感謝的是與我一起進行各項貧窮研究的研究員，包括呂大樂、蔡海偉、李劍明、林靜雯、李晷偉、葉盛泉及Peter Saunders等。我在和他／她們共同工作及討論的過程中學到不同的知識、經驗和人生態度，豐富了我對貧窮問題的認知、分析和思考。

我亦要感謝曾經資助或委託我進行不同貧窮研究的機構，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樂施會、深水埗區議會、研究資助局，以及中央政策組等。沒有這些機構的財政支持，各項研究便無法進行。社聯與樂施會一直是筆者就貧窮問題踐行倡議工作的伙伴。我要特別感謝社聯的蔡海偉、陳惠容及黃和平，書內提及社聯眾多的貧窮研究，很多的建議是經由我們一起討論，必須向他／她們致意。

在本書歷經十年的籌備及出版過程中，我的研究助理，包括黎婉媚、蕭德健、歐陽達初、歐詠芝、羅婉萍、林雅雪、祝寅及衛昕等在不同時期協助我搜集資料、整理內容及制訂圖表，我對他／她們的落力工作表示讚賞和感謝。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周永新講座教授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唸社工本科時的啟蒙老師，我一直記着他致力改善香港貧窮人士福祉的言教和身教。我衷心感謝他能在百忙之中為本書作序。周永新教授接受扶貧委員會委託對香港退休保障作出綜合研究，我對此充滿盼望和信心。我亦要感謝余志穩博士為本書寫序。他當社會福利署署長時，我們是談判的對手；他退休後，卻變成我的好友，一起於融樂會當管理委員會成員。由前官員到現樂施會總裁，余志穩博士一直關心貧窮問題，由他為本書

寫序實別有意義。

中華書局高級經理黎耀強先生促成本書的出版，我感謝他對我的信任，我也為一再延後交稿而令他及同事要在假期趕工而致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同意本書使用其感人的照片以反映貧窮人士的生活面貌，鍾泰來先生提供出色的照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胡美蓮及社聯的蔡海偉分別為本書推介，以及協助本書出版的其他朋友及學生，都是我必須感謝的。

在我撰寫本書的前後近十年歲月，沒有我太太方旻煥的鼓勵和支持，我很可能經已氣餒並放棄。她的同行令我可以堅持為香港的基層市民多做一點事情，但我對自己只有很少時間陪伴她和女兒確實抱有歉意。在審稿期間，旻煥日以繼夜地修訂書稿，大女兒灝昕協助校訂，小女兒灝晴從旁打氣。家人無限量的支持，為我充電、加油，我實無言感激。

在修訂的過程中，我們不禁記起了上一代的往事。旻煥想起了與患病失業的父親申請綜援被拒，在社會保障辦事處長長的走廊呆坐的一幕，也想起跟父親向親戚借錢無門的窘迫。我也記起九十年代中進行邊緣勞工研究時，外母是我訪問的對象，她由五十年代成為第一代工廠女工，一直努力工作到1990年，到七十多歲才願意退休。我的父母則一直讓我自由發展、自由選擇；中學階段，我常常透過學校的紅十字會青少年團的服務去訪貧問苦。這些經歷促使我對基層人士的苦況有所體會及認識，也影響了我的人生方向。

這本書是獻給我的父母、已故的外父外母，從他／她們身上我們承傳了堅毅的精神，亦延續他／她們對下一代及未來「無窮」的盼望。

黃 洪

2013年7月草於香港中文大學

目 錄

周永新 序 III

余志穩 序 V

自 序 VII

第一章 香港貧窮：從隱形到浮現

一、香港貧窮的「浮現」 2

二、本書的目標及結構 11

第二章 貧窮的定義及量度

一、貧窮的定義：學術與政治的爭論 16

二、絕對貧窮 (Absolute Poverty) 18

三、相對貧窮 (Relative Poverty) 26

四、綜合方法 (Integrated Approach) 38

五、結語 48

第三章 整體貧窮狀況與兩性不同的處境

一、香港的貧窮狀況 54

二、不一樣的窮人，不一樣的處境 65

三、男性與貧窮 68

四、女性與貧窮 80

第四章 香港貧窮的成因：微觀與宏觀分析

- 一、對香港貧窮成因的不同解釋 92
- 二、微觀視角：個人行為及文化 93
- 三、宏觀視角：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轉變 97
- 四、結語：微觀與宏觀以外 116

第五章 中層視角：社會資本與社會排斥

- 一、社會資本與社會排斥 122
- 二、貧窮與社會資本 123
- 三、香港社會資本的弱化 126
- 四、貧窮戶的社會資本 127
- 五、貧窮與社會排斥 136
- 六、少數族裔面對的社會排斥 140
- 七、新來港婦女面對的社會排斥 144
- 八、社會排斥的機制與動力 146
- 九、結語 158

第六章 不再安全的安全網

- 一、綜援個案的上升 164
- 二、綜援人士的生活水平 168
- 三、綜援制度的三次檢討 175
- 四、綜援真的養懶人？ 179
- 五、綜援未能滿足基本需要 184
- 六、結語 188

第七章 人力資本 跨代貧窮

- 一、兒童及青年貧窮率狀況 193
- 二、青年失業問題 197
- 三、居於偏遠地區青少年的貧窮情況 200
- 四、人力資本投資——香港的政策回應 203
- 五、宏觀介入：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 213
- 六、中觀介入：增強橋樑社會資本 217
- 七、不同扶貧策略的應用 219

第八章 邊緣勞工 最低工資

- 一、向下流動的邊緣勞工 226
- 二、不受保護的苦勞工 228
- 三、在職貧窮的浮現 231
- 四、在職貧窮的定義 233
- 五、在職貧窮狀況（1996年－2005年） 241
- 六、爭取最低工資的行動 245
- 七、設立最低工資對弱勢社群的影響 247
- 八、政策討論及建議 252

第九章 長者貧窮與退休保障

- 一、香港長者貧窮狀況 261
- 二、長者面對的匱乏與社會排斥 266
- 三、長者貧窮的原因 271
- 四、香港養老及退休保障制度 277
- 五、結語：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291

第十章 貧窮社區與社區發展

- 一、貧窮的地域集中 296
- 二、香港貧窮社區的分佈 297
- 三、市區舊區中的貧窮 300
- 四、資產為本的社區發展 305
- 五、如何協助貧窮社區脫貧的建議 313
- 六、社區經濟發展 316
- 七、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經濟互助計劃 318

第十一章 出路：從扶貧到減貧

- 一、貧窮問題的存在：從否認到承認 330
- 二、香港政府的扶貧政策 332
- 三、香港貧窮：不同層面的成因與介入 338
- 四、思考未來的出路 343
- 五、結語 351

參考文獻 355



大角咀籠屋（陳木南攝），圖片來源：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第一章

香港貧窮：從隱形到浮現

貧困是一種痛苦。窮人要承受來自食物缺乏和長時間工作帶來的肉體上的痛苦；承受身為附屬品以及缺乏權力的屈辱而帶來的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作出某種取捨而帶來的道義上的痛苦——例如，對於手頭上一筆有限的錢，是用來挽救一個生病的家人的生命，還是用來養育孩子？……窮人並不懶惰、愚蠢或生活腐化。

(Narayan et al., 2000, p.3)¹



貧窮是一種痛苦。但這帶來痛苦的幽靈一直在全球的大地上陰霾不散。它不單在第三世界的農村持續出現，亦存在於全球的大都會中。在非洲，眾多的難民要面對戰亂、饑荒和疾病的威脅；在紐約、倫敦等大都會，不少無家者仍要靠慈善團體的協助才能免於飢餓及凍死街頭。在香港，我們經常在街頭見到年老的長者推着沉重的手推車，倚靠拾荒來維持生計；不少貧窮人士亦要等待街市臨近收市時去買平價靚菜，才能應付高昂的物價。在九十年代全球化急速擴展，香港的勞動階層與全球各地的勞動者一樣，出現明顯的貧窮問題。香港可能被視為經濟已發展地區，但事實上貧窮從未脫離香港。

一、香港貧窮的「浮現」

在1961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只有2,353港元，至2011年已經大幅增至273,779港元。² 若單從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來看，自六十年代以來，香港的經濟一直有長足的發展，但現實上香港的貧窮問題並沒有隨着經濟發展而消除。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出現後，香港以金融及房地產所支撐的泡沫經濟爆破，經濟大幅下滑，香港的貧窮問題更嚴重惡化。

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由1997年的10.2%，大幅下降至1998年的-5.5%。在2001年及2003年又經歷了美國九一一事件及SARS事件的衝擊，香港經濟一直持續低迷。自1999年至2003年，除了在2000年經濟有3.1%的正增長外，其餘四年，均出現1.9%至2.9%倒退，香港經歷了自八十年代以來最長的一次經濟衰退，勞工失業及減薪的情況非常嚴重。在2003年，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下降至186,704港元，低於1996年水平，失業人口高達275,200人，失業率高達7.9%，大量失業人口造成香港貧窮問題急速惡化。

在2004年至2007年香港經濟出現較強勁的復甦，失業問題得到解決。然而，這一期間在職貧窮問題開始浮現。在2004年至2007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年增長由4.0%至8.9%不等。在2007年，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上升至238,676港元，總勞動人口連續四年上升至363萬人，失業人口下降至145,300人，失業率跌至4.0%。據樂施會（2012）有關在職貧窮的研究，在2003年在職貧窮住戶人口數目為608,900人，在職貧窮率為10.8%；至2007年，在職貧窮住戶人口數目持續上升至650,100人，在職貧窮率為11.3%。

2008年至2009年經濟再次出現低谷，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只有2.8%，2009年更有3.0%的倒退，失業率回升至5.4%。2010年香港的經濟出現回升，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了6.3%，2011年年增長率亦達8.2%，為273,779港元的歷史新高。可是，至2012年第二季，香港的貧窮住戶數目仍然有451,000戶，貧窮人口數目高達1,176,500人，貧窮率達17.6%。³

香港經濟有快速的發展，只代表香港整體的經濟水平在總量上的進步。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並不代表所有香港市民的生活均獲得同樣的進步，並不代表所有市民均可以脫離貧窮的生活。事實上，香港的貧窮問題從未獲得真正的解決。在九七前，香港殖民地政府一方面認為貧窮問題並不嚴重，亦視「收入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存在的情況，反而成為市民追求社會階梯提升的「動

力」。殖民地政府亦認為在經濟轉型中被淘汰的勞工及所引起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是經濟轉型必須經歷的「陣痛」。殖民地政府長期對於貧窮問題的無視及漠視，導致了今天香港貧窮問題的嚴重惡果。

全球化下的香港貧窮

二十世紀全球經濟出現一體化的趨勢，到廿一世紀全球化的趨勢將會加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將會擴展遍及全球每一個角落。然而，伴隨着全球一體化而來的是跨國企業超越國界的擴張，其勢力透過合併與收購的活動將極速膨脹。全球化無疑為資本家帶來無限的商機、無限的市場以至無限的勞工供應——這是資本家的夢樂園。電訊科技的革新、互聯網的興起，電子貿易、網絡社交的出現，「新經濟」替代舊經濟，這一切像在宣告一個新經濟時代的來臨。世界經濟不單出現一體化，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似乎可為人類帶來更高及更好的物質文明。

但是，現實卻非如此美好，全球化對不同階層帶來完全相反的影響；對大多數勞動階層來說，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大於正面。正如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濃縮（以機器及科技替代勞工）與集中（資本的兼併與壟斷）將會帶來勞工「貧困化」。全球化帶來資本高度流動，生產性資本向較低勞動力成本轉移，而金融性資本則化身成為國際熱錢尋找每個利潤極大化的機會。各地經濟結構迅速轉型，發達地區的製造業人口大幅下降，結構性失業問題成為各國的難題。失業高企進一步加深勞資雙方原有權力的不平衡，管方的權威大幅上升，靈活管理文化又隨着全球化在全球迅速蔓延。各私營及公營企業大量聘請臨時、合約、兼職及外判勞工，大量勞工只能找到低工資、低保障的工作。全球化為大多數人民帶來恐怕不是富足安穩的生活，而是貧窮不安的日子。明顯地，全球化帶來的利益主要是由資本所分享，其貧窮惡果卻主要由勞方所負擔。⁴

無論是過去及現在，不少經濟學者相信經濟發展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最佳方法。香港與其他新興工業國的透過外向型加工的高速經濟增長發展模式，更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視為第三世界國家脫離貧窮的典範，這些機構經常向

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銷這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策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香港與其他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國均被視為成功者，正式脫離了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的行列。若我們能夠細緻檢視香港經濟發展能否解決貧窮問題，將有助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思考是否會全盤接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所開出的，解決貧窮問題的「自由主義」藥單。

香港可能被視為已經脫離貧窮，但事實上貧窮從未脫離香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無論是政府和市民均並未意識到貧窮問題的嚴重，香港的貧窮長期處於「隱形」的狀況。為什麼香港的貧窮問題會處於隱形的狀況呢？

積極不干預的管治哲學

蔡明璋在分析台灣的貧窮時指出，台灣經濟發展導致均等分配的迷思、威權體制的發展主義，以及一種普遍的「經濟發展崇拜」。在經濟發展和威權國家結構的背景下，貧窮階級是被忽略的一群。蔡明璋指出台灣民眾對台灣貧窮現象的知覺非常有限，貧窮似乎成為這個「富裕社會」的禁忌——政府企圖「消滅」它。台灣民眾儘管知覺到貧富不均的分配結構，但很少嚴肅的看待社會中貧窮者及其問題。⁵ 香港的情況與台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無論是政府與市民均很少認真對待貧窮者及其問題，但香港貧窮隱形的原因與台灣也不盡相同。

首先，香港貧窮問題的隱形與政府對貧窮的看法及其管治哲學有直接關係。香港殖民地政府從來不承認香港出現嚴重的貧窮問題，亦傾向將貧窮問題視為個別貧窮人士（如老弱病殘等人士）本身缺乏能力或其意識有問題（如缺乏工作動機）所造成。政府並宣稱成立了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後，香港社會已經成功地設立安全網，再沒有人會因為貧窮而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貧窮問題亦因而得到基本解決。更重要的是，政府認為透過大量的社會服務如房屋、醫療、社會福利及教育，已為低下階層進行了大量的補助，所以社會政策已經有一定的財富再分配作用，減輕貧富不均的情況。港府不承認香港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忽視其結構性的成因，這明顯是服膺於其「積極不干預」管治哲學。

香港殖民地政府最重要的管治哲學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一直強調政府不

要過份積極介入經濟，政府的開支預算強調要量入為出，開支增長速度必須以香港整體增長速度為限，而且亦要避免公營部門過份膨脹佔用私營部門的資源，港府有意識地將公營部門的開支限制在本地生產總值的15%至20%之下。很多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視香港政府是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經濟的典範。⁶ 他們相信一個弱勢不干預的政府最能讓自由市場去調節經濟以達至經濟繁榮。

儘管這弱勢政府的假設並不能通過細緻的檢視，但這管治哲學卻成為香港政府強調要「創造財富，而不是要分配財富」的基本論調。政府有意無意之間經常強調香港經濟整體增長的成績（財富增長的成績），但卻忽略個別社群未能分享財富，處於貧窮的事實（財富分配的結果）。這施政哲學令香港官員習慣將貧窮的事實掩蓋在繁榮的地毯之下，貧窮變成是微不足道或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所以，貧窮不會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要議題，只有當貧窮引起社會不安和動盪時，才會引起政府的注意。例如，出現1966年及1967年的暴動後，才促成了七十年代的勞工立法、十年房屋計劃及普及教育等等。

受干擾的階級形成

不單政府忽略貧窮的存在及嚴重性，香港市民對貧窮的意識亦不強烈，亦未構成集體行動的基礎。市民雖感覺貧窮的存在，但並未構成集體的不滿意識及導致廣泛的集體行動去改變貧富不均的社會分配。換句話來說，香港低下層市民的階級意識及階級行動並不強烈，貧窮問題亦因此處於隱藏的位置。

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 (class formation) 可說是一個「不斷受干擾」而從未完成的過程。⁷ 其中最重要的干擾因素是不斷有新來者加入成為香港勞工的一部分。在戰前已經有南亞裔移民來港經營及擔任軍隊及保安工作。在四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及七十年代後期，有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八十年代開始有大量亞洲家庭傭工加入，至九十年代再有新移民家庭經團聚來港、外來勞工及非法勞工大量出現。更重要的是這些香港勞工階級的新來者通常佔據着勞工階級中最脆弱的經濟位置，而對那些原本佔據這些最低層位置的先來者產生替代的作用。

這些來自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的「最新」移民，其階級位置及處境與西方國家中的少數族裔情況相近，由於被「社會排斥」，⁸ 這些新移民不能完全融入本地的勞工階級中。而亞洲外傭、合法及非法外勞更因政府的入境政策防止其在港落地生根，加上其他客籍勞工或地下經濟活動的「黑工」身份，令這些外來勞工的社會及經濟位置有別於本地工人，所以無法與其他工人組成有機的勞工階級。

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預的另一原因是「滲透性」的階級結構。作為生存策略或增加本身的利益，不少工人在香港安頓及有一定積蓄後，在家庭的協助下便開辦小企業，變成自僱者或小老板。他們「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以及波動的階級流動經驗，妨礙這些早期移民發展出激進的勞工階級意識，反而發展出一套「不定型」的階級意識。微觀層次中個人不確定的階級位置形成為宏觀層次中社會滲透性（permeable）的階級結構。

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受着干擾的另一個原因，是工會運動缺乏組織者。香港工會的組織者受中國以及香港政治發展所影響，不斷自願或被迫離開香港或工運的行列，例如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五十年代初期，均出現工運骨幹由香港返回內地的情況，令香港工運多次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由於缺乏中層組織者令工會的基層組織弱化，缺乏在廠部及工場的組織及鬥爭經驗，再加上九十年代之後經濟轉型，傳統的製造業式微，服務業興起，而服務業的勞動過程分散，勞工並非在同一工場工作，令工會難於組織，這些均是造成宏觀上香港的勞工階級形成受干擾，以及在微觀上的階級意識不定型的重要因素。

由於勞工階級的形成受干擾，及其不定型的階級意識，香港勞工雖然感受到貧窮的困苦，但多數時候並未將之視為資本家剝削的結果，並未視貧窮為勞工階級集體所面對的社會結構問題，反而很多時採取個人或家庭的生存策略——勤力工作，努力讀書，想方設法掙錢，置業——來應付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能向上流動，脫離貧窮的行列。所以貧窮的經歷只成為個人的經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貧窮只處於若隱若現的狀況，並未成為社會運動或社會組織的動力。